

魅力与收获：三燕文化研究新进展略议

——以北票境内的相关考古发现为例

赵志伟 王 宇 万 欣

在中国北方十六国时期，鲜卑族是当时最有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其中的东部鲜卑慕容部从3世纪初迁居辽西到436年北燕灭亡的200多年间，在今之辽西地区先后建立了三个地方割据政权，即慕容皝所建之前燕(337-370年)、慕容垂所建之后燕(384-409年)和鲜卑化的汉人冯跋所建之北燕(409-436年)，在中国北方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文化大碰撞和大交流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后世留下了一批独具特色的文化史迹。三燕文化，即指主要发现于朝阳和北票境内大凌河流域的与前燕、后燕和北燕及前燕以前的慕容鲜卑有关的考古学文化，在辽宁全省境内的众多考古学文化中，属于最具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的一支考古学文化。

1. 北票境内发现的三燕文化重要史迹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与三燕文化相关的遗存大多分布在辽西地区偏北部，主要是北票境内南部和与之毗连的朝阳县东北部的大凌河流域。大凌河流域的水系与低缓的山峦纵横交错，地貌呈丘陵状，属于内蒙古草原与相对开阔的大凌河平原之间的过渡区域。这一带在历史上原属汉代所设辽西郡的一部分，自曹魏初年(约当3世纪初)东部鲜卑先祖莫护跋率部自塞外入居辽西后，这一带便成为鲜卑慕容部的世居祖地和“龙兴”之所。如果仅对发现于北票境内重要的三燕文化史迹做一下盘点，则不难发现会有如下之最。

① 辽西地区最早发现的鲜卑墓地——房身村墓地。该墓地位于北票市章吉营子乡房身村北山，被认为是慕容鲜卑自身发展的中期阶段——从慕容廆率部回迁徒河之青山(大致为大凌河中下游一带)后，至慕容皝建立前燕政权为止的一处具有代表性的墓地。此外，该墓地的M2和M8分别出土了2件金步摇饰，正是由于出自该墓地的金步摇饰的发现，学术界第一次将以房身村墓地为代表的这一类墓葬与史书上记载的慕容鲜卑联系起来^[1]。

② 国内最早发现的北燕将军墓——冯素弗墓。该墓位于北票市西官营镇梁杖子村馒头沟村民组将军山东麓，1965年9月发现并发掘，包括冯氏本人和其妻属的墓葬共2座。是迄今所见唯一的一座北燕纪年墓^[2]。

③ 规模最大的一处三燕文化墓地——喇嘛洞墓地。该墓地位于北票市南八家乡四家板村喇嘛洞村民组西山坡上，1993年至1998年先后进行了5次勘探和发掘，占地面积约10000平方米，共清理出三燕文化墓葬416座。其年代约当3世纪末至4世纪中叶，是一处与前燕建国前后活动于大凌河流域的慕容鲜卑有关的大型墓地^[3]。

④ 首次发掘的三燕早期建筑址——金岭寺建筑址。该建筑址位于北票市大板镇金

岭寺村西北的大凌河二级台地上, 2000年7月至11月进行发掘, 揭露面积3900平方米。属于一处可能与曹魏初年(3世纪中叶左右)慕容鲜卑先祖莫户跋率部自塞外入居辽西时, 曾“始建国于棘城之北”这一历史事件有关的建筑址^[4]。

⑤ 出土具有早期鲜卑文化特征的成组陶器数量最多的墓地——大板营子墓地。该墓地位于北票市大板镇波汰沟村大板营子村民组西台地上, 1994年和1999年共进行了3次勘探和发掘, 共清理墓葬28座。其年代约当3世纪末至4世纪初, 属前燕建国以前慕容廆时期的遗存^[5]。

北票境内的这些重要的三燕文化史迹同朝阳县境内的十二台乡两晋墓葬群、88M1、后燕崔暹墓、袁台子壁画墓以及朝阳市内的三燕龙城宫城南门遗址一起, 在大凌河中上游两岸及丘陵缓坡地带约6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形成了一个以慕容鲜卑遗存和三燕史迹相对集中的文化区域, 其整体性、重要性、典型性和特殊性为北方十六国时期的考古发现所仅见^[6]。

2. 三燕文化研究的新进展和新启示

上述三燕文化遗存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文化特征, 使其在当今的考古文化中独具魅力, 引人入胜。

魅力之一 以金步摇饰和铜鎏金镂空鞍桥包片这两种经典器物为代表, 构成了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服饰风格和民族特色的马具文化。

魅力之二 北燕纪年墓冯素弗墓的确认, 使其成为一个考古发现与史籍记载相互印证的经典墓例, 也几乎成为现今通史、专史中逢论必引的重要墓例。

魅力之三 迄今所见规模最大的一处北方十六国时期的三燕文化墓地——喇嘛洞墓地将因其全面发掘、系统整理、综合研究及墓地资料的首次全景式发表而魅力无限。这些魅力表现在分布密集而又排列有序的墓葬布局、保存较好的大量具有鉴定价值的人骨标本、随葬的大量铁工和铁兵、形态多样化的陶器群、见于数座墓内的铁甲堆积以及首次据以复原的甲骑具装模型等。

魅力之四 金岭寺建筑址是迄今所见唯一的一处经过考古发掘且年代早于燕都龙城的建筑址, 由其规整的结构、对称的布局所反映出来的祭祀和礼仪性质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魅力之五 形制原始、组合完整、共生关系明确的大板营子墓地陶器群的出土, 为中国北方鲜卑陶系的分期和类型学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标本。

此外, 三燕文化本身还存在许多有史可据、令人企盼的待解之谜, 诸如龙腾苑之谜、大棘城之谜和前燕纪年墓葬之谜等^[7], 显然, 这些有待破解之谜也许是三燕文化的更大魅力所在。正是由于上述这些魅力的吸引, 促进了以下相关研究的相继展开, 并不断给人以新启示, 引发新思考。

（1）在考古学研究方面

① 关于鞍桥包片

作为三燕文化的两种最为经典和最具代表性的器物，金步摇饰和铜鎏金镂空鞍桥包片在北票和朝阳境内虽均有发现，但两相比较，后者与前者又有所不同：

就金步摇饰而言，发现于北票境内者在年代谱系上带有一定的序列性，即房身村步摇（3世纪末至4世纪初）—喇嘛洞IM7步摇（3世纪末至4世纪中叶）—冯素弗步摇（415年），在形制上大致经历了一个从繁缛到简素再到以十字形框架取代“山题”式牌座的变化过程。日本学者认为在5世纪前半叶的朝鲜半岛开始出现的这种长着枝干的树木形装饰的新罗和伽耶金冠，均应在慕容鲜卑的步摇文化和圣树思想的传播和影响下的产物。6世纪以后受百济的影响，日本的藤之木古坟中也出现了新式的步摇冠^[8]。

到目前为止，共发现鞍桥包片计有11件（副），分别出土或征集于8处不同地点，其中有5件（副）来自喇嘛洞墓地。这5件（副）包片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A型和B型并行。根据田立坤先生的研究，可将这些鞍桥包片划分为平面近铜钉形的A型和平面近椭圆形的B型两种，二者均属于一种高桥鞍^[9]。其中A型包片在北票市和朝阳县境内均有发现，而B型包片则仅见于北票喇嘛洞墓地。因此，如果将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出土的2副铜鎏金镂空鞍桥包片视为最具代表性的A型包片的话，那么喇嘛洞ⅡM101出土的1副铜鎏金镂空鞍桥包片无疑应是B型包片的典例。这种B型包片目前国内虽尚未见有其他出土例，但它在日本誉田丸山古坟中却见有出土，被日本学者称为“特异椭圆形包片”，并认为极有可能是慕容鲜卑制作的“舶来品”^[10]。

二是铜制和铁制兼备。在喇嘛洞鞍桥包片中，除了ⅡM101出土的铜鎏金镂空鞍桥包片之外还见有铁制鞍桥包片，即ⅡM202出土的素面并带有穿鼻的铁鞍桥包片和ⅡM266出土的铁镂空贴金鞍桥包片，其形制分别与前述A型和B型铜制包片完全相同。显然，这是一个填补空白的重要发现，在中国两晋时期、朝鲜三国时期和日本古坟时代的马具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除了上述两个特点之外，就目前所见出土鞍桥包片的墓例而言，喇嘛洞ⅡM101和ⅡM202是不多见的两个包片与人骨较为完整、相对位置关系明确的墓例^[11]。在这两座墓中皆随葬包片1副，各一大一小两件，且均置于死者足下。而值得注意之处在于两件包片皆是以上小下大（即距足部较近处置较小的包片，距足部较远处置较大的包片）的方式陈放的。若将这种陈放方式与人骨的葬式和面向联系起来考察，则似乎在向我们作出这样一种暗示，即较大的鞍桥应在人体之前，而较小的鞍桥应在人体之后，亦即鞍桥上的两件包片的安装方式应该是前大后小，而不是以前通常所认为的前小后大。这种安装方式不仅与马背前宽后窄的自然形状相适合，也便于骑乘者自鞍桥较低的后部骗腿跨越骑乘。

此外，从鞍桥包片和马镫出土情况来看，这两种配套合用的马具随葬在一起的墓葬虽不

乏其例，诸如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喇嘛洞ⅡM266等，但在随葬有鞍桥包片的喇嘛洞ⅡM101和ⅡM202中，尽管其他马具诸如衔镡、带扣等一应俱全，然而却均不见有马镫随葬，这是一个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的现象^[12]。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似乎是与这些马鞍一起随葬的马镫或许还只是一种不易保存下来的皮质脚扣，这类脚扣有学者称之为“绳套式马镫”，曾见于晋宁石寨山西汉中期(前2世纪)墓葬出土的1件贮贝器上。在该器表现战争场面的模型中，一赤足骑士的脚拇趾套在垂于马腹一侧的绳套内^[13]。由此则可推测，无论是十二台乡88M1的铜制马镫、还是喇嘛洞ⅡM266的木芯铜包边马镫，其使用范围还仅限于那些身份等级较高者。在马镫普及应用的初期似乎经历过一个以木、铜制成的刚性马镫和以皮革制成的柔性脚扣并行互补的阶段。

② 关于北燕冯素弗墓的后续研究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其一，据《晋书·冯跋载记》冯素弗为北燕燕王冯跋之弟，可谓皇族嫡亲，其高规格的墓葬形制和大量包含汉、鲜卑乃至西域文化因素的随葬器物是十六国时期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民族关系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冯氏墓除了在石椁形制、墓向、祀牛、殉狗、高圈足炊器等方面保留了北方鲜卑文化传统外，在更多方面诸如瘞印、金珰附蝉、铁旗座与安车、画棺与画壁、中原式的生活用具(铜甗、铁镜等)和文具(石砚墨丸)以及兵器猎具等则表现了中原文化风格^[14]。

由这两种不同文化因素所涉及的对冯素弗本人族属判定的问题，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似乎也成了不是一个问题的“问题”。本来，冯氏的鲜卑化的汉人身份是根据史书上的相关记载确认的，并已被学术界普遍认可。然而，日本学者的研究结论却恰恰相反——冯氏应为汉化的鲜卑人^[15]。而由此联想到一个被忽略的现象是，在冯素弗墓、崔暹墓和李廌墓这三座墓葬中，崔氏和李氏墓的纪年均是直接通过随葬的刻有年号的墓表或墓砖确定的，唯独身份和墓葬规格最高的冯氏墓不见有文字纪年刻记，该墓纪年是依据随葬的“范阳公章”和“辽西公章”等4方汉文官印及《晋书·冯跋载记》上相关的对死者身份以及卒年的记载才得以确认的^[16]。这与身份级别不高的崔氏和李氏刻意以墓表或墓砖的形式来表明自己的汉族身份和卒年的做法明显不同，而这一点是否会与作为鲜卑人的冯氏不谙汉字、抑或是有意掩盖自己的鲜卑祖籍而不留刻字纪年于墓内有关？再者，同那些随葬器物所表现出来的诸多汉文化因素相比，表现在葬制和葬俗上的鲜卑文化因素更是一种渊源深远、根深蒂固、不易改变的文化因素。因此，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位通常被认为是鲜卑化汉人的冯氏，似乎仍难以完全排除疑似汉化程度很深的鲜卑人之嫌。

其二，从首次发表的出自该墓的马铠甲片资料来看，多为由若干锈结在一起的甲片组成的残块。由于这类残块上往往会保留有甲片组合原状和联缀痕迹，因而在铠甲的研究中，它们显然要比大量的散片更具典型意义，故相对于散片而言，一般将其称之为“典型块”。其

中片长7-8厘米以上者应为马身甲上的甲片。这类甲片的片孔较多，有的达30多个以上(如I、II型片)，其联缀工艺亦相应复杂和罕见，由此可窥见与冯氏的将军身份相匹配的铁马铠甲的结构和制作工艺确非一般^[17]。这些零散的典型块虽已失去据以对其进行整体复原的价值，但就甲片上的皮条连缀和包边痕迹的保存状况以及由此保留的制作工艺信息而言，显然要比喇嘛洞IM5铁马铠甲好得多和丰富得多。

③ 金岭寺建筑址的发掘和研究

金岭寺建筑址的发掘及发掘报告的发表是三燕文化研究新进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一般认为，这处建筑遗址应是慕容部始定居于辽西大凌河流域的一处早期高等级建筑遗存，具有前燕早期都邑的性质。在其建筑格局上，沿着纵轴线和横轴线采取均衡的对称方式，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及院落进而以奇数形式组合的院落组群构成若干建筑单元。这种经过精心设计的建筑格局明显具有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和礼教性质；而建筑外围环绕的带有防护作用的壕沟的出现，则又使得该处建筑与封建性的集权政治有关^[18]。田立坤先生通过对该建筑址布局特点的分析，及《晋书·慕容儁载记》上的相关记载，首次提出其是一处特殊的礼制性建筑“庑庙”的假说，指出“庑庙”即“慕容庑庙”，此庙应为慕容儁于357年所建，沿用至后燕末年，废于北燕^[19]。从这一假说对该建筑遗存复原的平面结构来看，该建筑遗存应由5组建筑组成(现存3组，另2组已被河水冲毁)，其中北侧中部和东西两厢各1组，均由3个并列的院落构成，共9个院落；北侧西部和东部各1组，均由5个并列的院落构成，共10个院落，如此组成一个坐北朝南、平面呈“凹”字形的建筑群体。这样无论是在总体布局上还是在局部结构上，都可形成以正中一间的中轴线为中心的左右对称的模式，其最大特点是它的奇数对称布局。这种在建筑格局上刻意追求均衡和对称的现象，与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王莽九庙较为相似^[20]。在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慕容鲜卑既然属于汉化最早、最深的一个民族，则在这种祭祀性和礼仪性建筑的设计和营建上，是否也会植入某些诸如“三路三重”“五方五色”和“九五之尊”等有某种“数字化”的汉文化传统礼制观念色彩的寓意呢？在这方面，金岭寺建筑遗址的奇数对称布局的确为我们留下了再作进一步思考的空间^[21]。

④ 喇嘛洞铁器的系统整理和研究

从中国冶铁史的角度来看，喇嘛洞墓地出土的十六国时期的大量铁器是其最大魅力所在。这批铁器的数量之大、种类之多、随葬之普遍，皆为目前国内所见其他地区铁器时代的大型墓地所未有。据初步统计，在随葬铁器的310座墓中，共出土各类铁器2740多件(副、套、枚、组)，每座墓葬平均随葬铁器8件以上，包括生产工具、兵器、马具和其他器类共5大类80多种，其中铁工(农具和手工工具)、铁兵和铁马具是喇嘛洞铁器的主要部分。从东亚地区范围来看，喇嘛洞铁器与在朝鲜半岛发现的三国时期的铁器和在日本九州地区发现的古坟时代的铁器，在形制、种类、组合以及所反映的总体文化面貌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因

而可将此三者合为一体,其视为4至6世纪东亚地区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完整的铁器系统。鉴于这一铁器系统主要是由8种铁工(铍、钁、钺或铲、镰、斧、铤、凿、削)、4种铁兵(剑、刀、矛、镞)和4种铁马具(鞍桥包片、镫、衔镡、带扣)共16种代表性器物构成的,故我们曾将其归结为“三铁十六器东亚铁器系统”^[22]。由于该系统内的铁器都是作为随葬品被有意识地置于当时的墓葬或古坟内的,因而所反映的各种历史文化信息更为丰富,研究价值也就更高。从这一点上来说,即便是作为东亚地区铁器发源地的中国中原地区也难以与之比拟。因此可以说,以喇嘛洞铁器为主要组成部分的4至6世纪的东亚铁器系统在整个古代人类社会历史上的铁器时代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⑤ 大板营子墓地墓葬资料的再整理

该墓地曾经过3次发掘,共清理墓葬28座。其中部分墓葬的资料曾分别于2003年和2010年进行过发表^[23]。鉴于该墓地的墓葬大多保持完整,对研究三燕文化墓葬的形制和陶器价值影响重大,故于最近又将其余尚未发表的保存完整的12座墓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整理,并编写出简报^[24]。从目前已发表的资料来看,在以朝阳十二台乡两晋墓群、科左后旗舍根墓群和新胜屯墓群为代表的早期鲜卑遗存中,新胜屯仅2座墓,陶器数量有限,舍根陶器的数量虽较多,但多为征集品。因此,可与大板营子陶器作整体比较者,只有十二台乡两晋墓葬出土的陶器群。但据统计,在出自大板营子墓地23座墓内的58件陶器中,陶罐和陶壶分别为37件和21件,陶壶的数量不及总数的一半;十二台乡两晋墓共21座,出土陶壶和陶罐分别为21件和12件^[25],陶壶数量已远超陶罐。

从东汉时期开始,内蒙古东北部向南至大凌河流域,从北向南,由早及晚,先后出现了夹砂大口罐和泥质灰陶壶,并逐渐形成了以这两种陶器为代表的陶器组合。这种陶器组合是早期慕容鲜卑最典型的遗存,流行于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和大凌河流域。大板营子墓地就是这种陶器组合在辽西地区的代表,也是这种陶器组合进入辽西地区的原始状态^[26]。慕容鲜卑进入辽西后,开始快速汉化,陶器组合也发生了变化,夹砂大口罐与泥质灰陶壶先后消失,这些都使得大板营子陶器群在北方地区鲜卑陶系的研究中作用更为重要。

(2) 科技考古研究

以北票喇嘛洞墓地的考古发现为契机,中日合作研究和科技考古研究亦相继展开。

① 铁器的保护处理、金相鉴定及人骨研究

其一,喇嘛洞墓地是随葬铁器最多的一处大型墓地,其总数达2740多件,在全部随葬器物总量中所占比重过半,这一点在目前所见国内已发表的大型墓地报告中尚属先例。1996年11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达成了共同研究的协议,确定研究的课题为“亚洲古代都城遗迹研究与保护——三燕都城等出土铁器及其他金属器的保护与研究”。在这次共同研究中,我们与日方专业人员合作,对铁锈所含的氯化物、硫化物进行了

测定和分析，并根据不同类别的铁器的锈蚀状况，对选出的30件铁器标本采用氢氧化锂（LiOH）法对其进行了保护处理，此举在国内尚属首例^[27]。

其二，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合作，对在喇嘛洞铁器中选定的32件标本进行了金相鉴定，其中农具9件、手工工具7件、兵器11件、其他器类5件。鉴定结果表明，喇嘛洞墓地铁器在材质和制作工艺上，明显受到了秦汉以来中原地区发达的钢铁冶铸和锻造技术的影响，在工艺上与中原地区属于同一个技术体系^[28]。这批铁器标本以锻铁制品为主，共26件，表明当时锻制技术已成为主要的制铁技术，工匠已基本掌握了在不同温度和锻打条件下铁质的变化规律。这些锻铁的材质又以炒钢为主，共13件，其中8件为兵器，表明炒钢已成为主要的制钢技术，并被广泛应用于军事上。对北燕冯氏墓随葬的16件铁器首次进行的金相鉴定结果表明，材质为优质的铸铁脱碳钢的铁器占一半，另有以夹钢制成的凿、以炒钢经淬火制成的剑及以炒钢经锻打制成的铁镜等^[29]。

两相比较，就铸铁脱碳钢而言，在喇嘛洞中占鉴定铁器总数的不足三分之一，而在冯氏墓中却占了鉴定铁器总数的一半。由此可见，在前燕至北燕时期的鲜卑社会中，随着铁器使用的普及，这种以生铁经过退火处理而形成的铸铁脱碳钢已明显成为一种使用率很高的铁器材质。

其三，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合作，对喇嘛洞墓地出土的人骨标本进行了系统的科学鉴定。鉴定结果表明，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的遗传学构成并不单纯，而是一个“多源性同种系”的人群。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的高颅性质显示其主体部分应属于东亚蒙古人种范畴，与朝阳地区发现的其他慕容鲜卑居民的颅型偏低的北亚人种特点大相径庭。因此，二者的族属可能并不一致。由于这是在依据400余个体的大样本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故其科学性是无可质疑的^[30]。与这一鉴定结果密切相关者是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的族属问题，对此，在学术界主要有“鲜卑说”（慕容鲜卑和宇文鲜卑）和“扶余说”两种^[31]。这一鉴定结果既然不支持“鲜卑说”，但是否就是支持“扶余说”呢？似乎亦不尽然，因为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的面部特征与历史上世居吉林四平或农安地区东汉晚期的扶余族所具有的“古东北类型”的面部特征也有差别，其体质特征的复杂性显示了其种系来源的多源性^[32]。看来，在目前还缺少有关扶余族人骨鉴定的大样本数据与之进行比对之前，显然还不宜从在体质人类学的角度对“扶余说”予以肯定。

总之，在族属问题上，目前还存在着一个如何将古文献相关记载与考古发现相结合得出的定性化结论、与通过人骨鉴定研究得出的量化结论进行参照对接或整合的问题。北方十六国时期的人口大迁徙、民族大融合、文化大碰撞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慕容鲜卑的民族成分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大大增加了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民族族属判定的难度。有鉴于此，许永杰先生曾指出：“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应建筑在谱系研究的基础上。”“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实践表明，这种谱系类比法要优于简单的三要素（即时代、地域和文化特征）类比法。”他在归

纳比较分别可能与拓跋鲜卑和慕容鲜卑有关的考古遗存各自独有的文化特征时指出：“随葬陶器在认定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和探讨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上，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33]因此，在讨论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的族属问题时，喇嘛洞陶器群与老河深陶器群在文化特征上的明显差异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② 铁制甲骑具装的复原研究

铁制甲骑具装是流行于我国北方十六国时期的一种重装骑兵装备。考古发现的与之密切相关的遗物是铁制的人胄、马胄及共存的大量甲片堆积。就目前所见，在墓内同时随葬这三种遗物者，除了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之外，就是北票喇嘛洞IM5和IM17了。其中88M1是最早的于1988年5月发现的随葬这类遗物的重要墓葬，不过遗憾的是，在清理过程中因缺乏经验，对甲片堆积处理失当，使其最终失去了复原价值。1995年秋，由这三种遗物构成的甲骑具装残骸终于又再现于喇嘛洞IM5之内，此次，我们以套箱法从该墓内整体取出保存，2003年夏秋之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荣金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着重对套箱内的铁甲堆积进行了室内清理和复原研究。通过对该副铁甲中的人胄、马胄和众多型式甲片共存情况的考察，结合铁甲堆积中的“典型块”上的原始遗构和连缀线索以及其他相关图像资料，按照一定的工作流程和技术方法，在反复比较和分析的基础上，以实证复原为主，推测复原为辅，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复原出国内第一套甲骑具装纸板模型^[34]。虽然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中的铁制甲骑具装因其无法复原而成憾事，而喇嘛洞IM5铁甲骑具装的复原则终于弥补了这一缺憾。

以喇嘛洞IM5铁甲骑具装的复原研究为借鉴，近年我们又对IM17的铁甲堆积进行了系统的室内清理和初步研究。此番清理是继IM5甲骑具装的复原研究之后，借鉴和参照已有经验和方法，对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铁甲堆积进行的第二次科学的、系统的室内清理。由于IM17的铁甲堆积的锈蚀程度之重和保存状况之差均甚于IM5，在此次清理中虽未能对IM17甲骑具装的原貌进行整体复原，但通过对堆积的甲片进行的科学、系统的提取和初步的分类考察，相信仍然能够对以后的相关复原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35]。

3. 作为地域性文化标志或符号的三燕文化

（1）三燕文化与大凌河文明

如果说文明是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那么，在辽西境内流淌着的大凌河这条文明长河中，三燕文化就是其最为厚重的积淀之一。早在3世纪初，曾为中国北方地区少数民族之一的东部鲜卑自离开内蒙古中部的世居之地以后，最初在其先祖莫护跋的带领下首次入居辽西，继而又随其第三代首领涉归迁往辽东北，289年东部鲜卑慕容部在其首领慕容廆的率领下，再迁回徒河之青山（约为今大凌河中上游一带）。此后，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苦创业，终于以大凌河流域为依托奠基立国。在立国之前及以后，慕容鲜卑历经与汉、扶余、乌桓和高

句丽等民族之间的冲突、融合和文化上的碰撞、吸收，创造了璀璨一时的以慕容鲜卑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区域性的民族文化——三燕文化。如前所述，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所见，在有关三燕文化的重要史迹中，位于北票境内的有金岭寺建筑址、三官甸子遗址、喇嘛洞墓地和太板营子墓地，位于朝阳境内的有龙城宫城南门遗址、团山子遗址、十二台营子墓地和袁台子墓地等。从空间分布来看，这些遗址和墓葬沿着大凌河两岸大体按年代的早晚由东北向西南布列，形成了一条由一河两地（即大凌河中上游、朝阳县东北境和北票市西南境）构成的“三燕文化史迹长廊”。这种三燕文化遗存空间布局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影响的历史条件下，地理因素（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和人文因素（慕容鲜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发展）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2）三燕文化、辽河文化与辽海文化

在经济大发展、文化大繁荣的当今之世，地域文化标志的确立已成为各地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以何种文化称谓作为辽宁地域文化标志或文化符号的问题上，学术界曾有“辽河文化”说和“辽海文化”说^[36]。如撇开持此二说的各种理由，仅就辽宁属于滨海省份这一点来说，“辽海文化”较之“辽河文化”似乎更具文化魅力和符号意义。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以及所创造的一切文化和文明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自然资源莫过于其所在区域内的水系了。辽河虽为辽宁境内第一大水系，但其主要流域仅限于包括辽北低丘区在内的辽河平原，辽西地区的大、小凌河和辽东地区的暖河和浑江等都是相对独立于辽河水系之外的重要水系，以这些水系和相应的生态环境为依托，曾在历史上产生并发生过区域性重要影响的两种文化，即十六国时期的三燕文化和两汉至隋初时期的高句丽文化。可见，只有以辽海之“海”的海纳百川的气势才足以涵盖和彰显辽宁全境中不同区域内的各种生态环境、多种经济模式、多民族人口构成以及据以形成的多元化的地域文化形态。其关系，如同王绵厚先生对“辽河文明”和“辽海文化”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形象比喻那样，应是一种“同心圆”式的、互为表里的不同层次的姊妹文化的关系^[37]。

然而，在文化概念的层面上，作为考古学意义上的“三燕文化”与作为文化学意义上的“辽海文化”是否也有相通之处呢？回答是肯定的。学术界曾将“辽河文化”的主要特点归结为以“闯关东”为代表的移民文化和以满汉融合为主导的北方多民族文化聚合^[38]。其实，“移民文化”和“多民族文化聚合”又何尝不是“辽海文化”的两大特点呢？而形成这两大文化特点的历史渊源最早即可追溯至有国史可考、有史迹可寻、有遗物可据的三燕文化。如前所述，包括慕容鲜卑在内的东部鲜卑早在3世纪中叶，在其先祖莫卢跋的率领下就已入居辽西，这应是一次有史以来最早的曾对这一区域的文化形态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移民事件”；而由这批包括慕容鲜卑在内的东部鲜卑移民及其后裔或后继者所创造的三燕文化，则更是一种融鲜卑、汉、乌桓、扶余和高句丽等文化于一体的“多民族文化聚合”。在历史上曾流徙于今之辽宁境内的诸多北方少数民族中，能够以封建割据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国家政

权,在对其辖境进行有效的王朝统治的同时又据以在北方乃至中原地区实现局部统一者,唯有慕容氏鲜卑而已。从历史地图上也可以看到,在三燕政权中,除了建于5世纪初、偏居今之辽西一隅的北燕之外,其中的前燕和后燕的版图均几乎辖括今之辽宁全境,其南界已达今河南南阳至安徽蚌埠之间的淮河一带^[39]。虽然这两个王朝所维持的统治时间并不长,但其打下的历史烙印之深、产生的文化影响之远,以至于在后世的辽之契丹、元之蒙古等这些骑马民族文化中还可找到某些慕容鲜卑文化传统的影子。可见,考古学意义上的三燕文化是文化学意义上的辽海文化的重要历史渊源之一。

(3) 三燕文化的符号意义、名片价值和品牌战略

“文化符号”、“文化名片”和“文化品牌”是近年流行于媒体和文化界的三个时髦用语。所谓“文化符号”指某一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称谓,它代表着一定时空范围内特有的历史和人文的文化形态。据相关研究报告,文化界已确定将“辽海文化”作为辽宁的地域文化符号^[40]。而与之相关的“辽河文化”则被文化史学者视为本土文化的一棵具有主干性质的“文化结构树”,他们认为,各市县所倡导的乡土特色文化均属这棵“结构树”上的一个支系。以这种乡土文化为切入点,有利于共建“人文辽宁”^[41]。显然,如果将大凌河流域视为西辽河流域的一部分,那么根植于大凌河流域的三燕文化亦应是这棵“文化结构树”上的重要支系之一。将“三燕文化”作为包括大凌河、朝阳和北票在内的“一河两地”的文化标志性称谓,在当前以旅游业为龙头的文化产业空前繁荣的形势下,对不断加强乡土特色文化建设,科学合理地利用本乡本土的文化资源,充分发掘其历史内涵,彰显其文化魅力,并以此来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方面,具有积极和现实的符号意义。

造型独特的金步摇冠饰、以铜鎏金镂空鞍桥包片为代表的较为完备的铜铁马具系统、世所罕见的甲骑具装和诸多纪年墓葬、大型墓地以及与宫城皇苑有关的建筑遗址等,所有这些不仅是三燕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3至5世纪的三燕文化的创造者向已进入21世纪现代文明世界的我们所展示出一张特色独具的“文化名片”。如何利用这张文化名片,不断充实和丰富辽海文化的历史内涵,为其增光添彩,使三燕文化走向全国进而面向世界,应是当前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进一步加强国内外相关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学术合作,对三燕文化继续进行深入多学科研究,并展开以乡土历史文化的科普教育为主旨的公共考古,让三燕文化走出学术圈,面向社会,普及大众,成为民间耳熟能详的科普常识,才能使三燕文化的名片价值得以最大实现。

党的十八大报告曾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科学昌明、学术繁荣、文化建设蓬勃兴起的当今之世,如何将具有上述符号意义和名片价值的三燕文化打造成为一个在全国性的地方文化建设中研究成果更多、知名度更高因而影响力更大的地域性的文化品牌,使之成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与地方文化建设良性互动的典范,这是需要我们不断进行思考和探索的课题之一。虽然这一课题的制定和实施三燕文化的品牌战略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还有许多实际工作要做,诸如三燕文化史迹的系统调查、勘探以及重点发掘和研究;前述“三燕文化史迹长廊”上的遗址公园和墓园建设、景观设计、保护与申遗;以三燕文化为主题或重要内容的乡土教材的编纂和公共考古的展开;以三燕文化旅游专线的开辟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产业的运作等等,但可以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既定方针,发扬锲而不舍的精神,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将三燕文化打造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文化品牌的战略构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注

- [1] 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关于房身M8出土的金步摇饰,参见孙国平:《试论鲜卑族的步摇冠饰》,《辽宁省博物馆、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会刊》,1981年。
- [2] 黎瑶渤:《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
- [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
- [4] 辛岩等:《金岭寺魏晋时期大型建筑群址考古发掘获初步成果》,《中国文物报》,2001年1月31日。
- [5]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北票市大板营子墓葬的勘探与发掘》,《辽宁考古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
- [6] 万欣:《鲜卑墓葬、三燕史迹与金步摇饰的发现与研究》,《辽宁考古文集》(一),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关于朝阳县境内发现的三燕文化重要遗存,可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王子坟山墓群1987、1990年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和《朝阳十二台砖厂88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11期;陈大为等:《辽宁朝阳后燕崔暹墓的发现》,《考古》,1982年第3期;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田立坤等:《朝阳古城考古纪略》,《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 [7] 参见朱子方:《记后燕龙腾苑遗址的发现》,《东北地方史研究》,1984年创刊号;田立坤:《棘城新考》,《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2期;辛发等:《锦州前燕李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5年第6期。至于墓表纪年为“永昌三年”(应为太宁二年,即324年)的李廆墓,其纪年并不在三燕纪年范围之内,只能算是东晋墓葬,而非原报告所定的“前燕墓葬”。
- [8] 毛利光俊彦(日)撰,李贤淑译:《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冠》,《东北亚考古学论丛》,150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 [9] 田立坤:《论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马具》,参见表一,《文物》,2010年第2期。
- [10] 桃崎祐辅(日)撰,姚义田译:《从倭出土的马具看国际环境——倭与朝鲜三国伽耶、慕容鲜卑三燕的交往》,《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2008年第1期。
- [11] 参见注[3],图四、五,图版七。
- [12] 参见注[3]。
- [13] 宋兆麟:《古代器物溯源》,143页及附图16-4,商务印书馆,2014年11月第1版。
- [14] 徐秉琨:《冯素弗墓的发现所引发的思考》,《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0),20页,辽海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
- [15] 内田昌功(日)撰,姚义田译,《北燕冯氏出身与〈燕志〉、〈魏书〉》,《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2辑,2007年。
- [16] 同注[2]。
- [17] 卢治萍:《冯素弗墓出土铁甲片研究》,《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1),28页,辽海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
- [18] 辛岩、付兴胜、穆启文:《辽宁北票金岭寺魏晋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辽宁考古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

- 版社，2010年7月第1版。
- [19] 田立坤：《金岭寺建筑址为“庙庙”说》，《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
- [20] 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另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发掘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7期。
- [21] 中国传统的宅院建筑的最高规格为左、中、右三路之制，其台基分为上、中、下三重；五方五色，即指东青、南赤、中黄、西白、北黑，象征一国领土。参见韩增禄：《易学与建筑》，158和111页，沈阳出版社，1999年6月第2版。
- [22] 万欣：《喇嘛洞铁工初论——兼议中国慕容鲜卑、朝鲜三国时期和日本古坟时代铁器葬俗的一致性与差异性》，《东北亚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 [23] 武家昌：《辽宁北票市大板营子鲜卑墓的清理》，《考古》，2003年第5期。另参见注[5]。
- [24] 王宇、万欣：《辽宁北票市大板营子墓葬的勘探与发掘(续)》，见本集第1页。
- [25]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阳王子坟山墓群1987、1990年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97年第11期。
- [26] 王宇：《北票大板营子墓地出土陶器研究》，见本集第107页。
- [27]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辽宁北票市喇嘛洞鲜卑贵族墓地出土铁器的保护处理及初步研究》，《考古》，1998年第12期。
- [28]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等：《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铁器的金相实验研究》，《文物》，2001年第12期。另参见陈建立：《从铁器的金属学研究看中国古代东北地区铁器和冶铁业的发展》，《北方文物》，2005年第1期。
- [29] 韩汝玢：《北票冯素弗墓出土金属器的鉴定与研究》，《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0)，辽海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
- [30] 陈山：《喇嘛洞墓地三燕文化居民人骨研究》序言部分(朱泓撰)，科学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
- [31] 关于“扶余说”和“宇文氏鲜卑说”，可分别参见(田立坤：《关于北票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的几个问题》，《辽宁考古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陈平：《辽西三燕墓葬论述》，《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2期。)在4世纪中叶，慕容皝曾分别对位居其西北部的宇文鲜卑和位居其东北部的高句丽进行杀伐攻略，徙掠其部众皆达五万余(口)。另据《资治通鉴·晋记》卷九七载，永和元年(345)，记室参军封裕在上书谏中也有慕容皝曾“南摧强赵，东兼高句丽，北取宇文，拓地三千里，增民十万户”之语，由此可窥见前燕境内人口的多民族成分之一斑。
- [32] 参见注[30]，158页。
- [33] 许永杰：《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北方文物》，1993年第4期。
- [34] 白荣金等：《辽宁北票喇嘛洞十六国墓葬出土铁甲复原研究》，《文物》，2008年第3期。
- [35] 万欣等：《辽宁北票市喇嘛洞墓地IM17铁甲堆积的室内清理》，见本集第255页。
- [36] a. 曲彦斌主编：《辽宁文化通史》，29页，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b. 辽宁文化符号和文化定位问题课题组：《关于辽宁文化符号和文化定位问题的研究报告》，《沈阳故博物院院刊》，第七辑，2009年。
- [37] 王绵厚：《纵论辽河文明的文化内涵与辽海文化的关系》，《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 [38] 同注[36] a。
- [39] 《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卷》，2010年。
- [40] 同注[36] b。
- [41] 同注[36] a，28页。

魅力と収獲：三燕文化研究の新進展略論

― 北票域内の関連考古発見を例として ―

趙志偉 王 宇 万 欣

中国北方の十六国期において、鮮卑族は当時もっとも成功した少数民族である。その中の東部鮮卑慕容部は、3世紀初めの遼西遷居から436年の北燕滅亡までの200年以上の間、現在の遼西地区において相次いで3つの地方割拠政権を建てた。すなわち慕容廆が建てた前燕（337～370年）、慕容垂が建てた後燕（384～409年）、鮮卑化した漢人の馮跋が建てた北燕（409～436年）は、中国北方民族の大移動と大融合、文化の大衝突と大交流の歴史上に濃い一筆を書き入れ、独特の特色を備えた文化史跡を後世に遺した。三燕文化とはすなわち、主に朝陽と北票域内の大凌河流域で発見された前燕、後燕、北燕、および前燕以前の慕容鮮卑と関係する考古文化を指し、遼寧省全域内の多くの古文化史跡の中で、地域色と民族的特色をもっともそなえた考古文化である。

1. 北票域内で発見された三燕文化の重要史跡

目下の考古発見からみて、三燕文化と関係する遺跡の大部分は遼西地区北寄りの地域に分布しており、それは主に北票域の南部とこれに連なる朝陽県北東部の大凌河流域である。大凌河水系と低く緩やかな山並みが縦横に交錯し、地形は丘陵状を呈し、内モンゴル草原と相対的に広くひらけた大凌河平原の間の過渡地にあたる。この一帯は、歴史の上ではもとは漢代に設けられた遼西郡の一部であった。曹魏初年（3世紀初頃）に東部鮮卑の先祖の莫護跋が部を率いて塞外より遼西に入居した後、この一帯は鮮卑慕容部の父祖伝来の地、そして「龍興」の地となった。北票域内で発見された重要な三燕文化の史跡をみるだけでも、すぐに大変傑出した遺跡が存在することがわかる。

① 遼西地区で最初に発見された鮮卑墓地：房身村墓地

北票市章吉営子郷房身村の北山にある。この墓地は、慕容鮮卑の発展の中期段階、つまり慕容廆が部を率いて徒河の青山（おおよそ大凌河中下流域一帯）に遷居して以降、慕容皝が前燕政権を確立するより前の代表的な墓地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ている。2号墓と8号墓からは、各2点の金製歩揺飾が出土した。この墓地の金製歩揺の発見によって、学术界は初めて、房身村墓地を代表とするこれら墓を史書に記載された慕容鮮卑と関連づけたのである⁽¹⁾。

② 国内で最初に発見された北燕將軍墓：馮素弗墓

北票市西官営鎮梁杖子村饅頭溝村民組の將軍山東麓に位置する。1965年9月に発見され、

発掘がおこなわれた。馮氏本人とその妻・親族の墓を含む全2基である。現在にいたるまで唯一発見された北燕紀年墓である⁽²⁾。

③ 最大規模の三燕文化墓地：喇嘛洞墓地

北票市南八家子郷四家板村喇嘛洞村民組の西にある山の斜面上に位置する。1992年から1998年の間に相次いで5次の探査と発掘を行い、占有面積は約1万㎡、全部で三燕文化の墓葬420基を調査した。その年代はおよそ3世紀末～4世紀中葉で、前燕建国前後に大凌河流域で活動した慕容鮮卑と関係する大型墓地である⁽³⁾。

④ 最初に発掘された三燕早期の建築址：金嶺寺建築遺跡

北票市大板鎮金嶺寺村北西の大凌河二級台地上に位置する。2000年7月から11月にかけて、3900㎡の面積を発掘した。曹魏初年（3世紀中葉頃）に慕容鮮卑の先祖莫護跋が部を率いて塞外より遼西に入居した時、かつて「始め国を棘城の北に建てる」という歴史的出来事と関係する建築址である可能性がある⁽⁴⁾。

⑤ 初期鮮卑文化の特徴を備えた土器組成数が最大の墓地の発見：大板営子墓地

墓地は北票市大板鎮波汰溝村大板営子村民組の西の台地上にある。1994年と1999年に合計3次の探査と発掘を行い、全部で28基の墓を調査した。その年代はおよそ3世紀末～4世紀初頭で、前燕建国以前の慕容廆期の遺跡である⁽⁵⁾。

北票域内のこれら重要な三燕文化の史跡は、朝陽県内の十二台両晋墓群、十二台郷磚廠88M1、後燕崔暹墓、袁台子壁画墓、および朝陽市内の三燕龍城の宮城南門遺跡と共に、大凌河中上流兩岸および緩やかな丘陵地帯の約650㎡の範囲内にあり、慕容鮮卑の遺跡と三燕史跡が比較的集中する文化区域を形成しており、その完全性、重要性、は北方十六国期の考古発見で稀にみるところである⁽⁶⁾。

2. 三燕文化研究の新たな進展と新事実

上述の三燕文化遺跡が持つ独特の歴史的 content と鮮明な文化的特徴は、それによって現在の考古文化のなかで独特の魅力を有しており、人を引き付けてやまない。

魅力その一：金製歩揺飾と金銅製透彫鞍金具というこの両種の象徴的資料を代表とし、独自の地方的特色を備えた服飾スタイルと民族的特色を備えた馬具文化を構成した。

魅力その二：北燕紀年墓である馮素弗墓の確認は、考古学の発見と史書の記載とが相互に裏付けあう典型的な墓の例となり、現在の通史・特定分野史の中で必ず引用される重要な墓の例となっている。

魅力その三：喇嘛洞墓地は現在までに明らかとなった最大規模の中国北方十六国期の三燕文化墓地である。喇嘛洞墓地の全面発掘、系統的な整理、そして総合的な研究は、墓地資料が初めて包括的に発表されたことによって、その魅力は無限に広がった。これらの魅

力は、密な分布と規則的な配列の墓葬配置、保存状態が比較的良好な大量の人骨標本、副葬された大量の鉄製工具と武器、形態が多様化した土器群、数基の墓内で発見された鉄製小札堆積、および初めて出土資料にもとづいて復元した重装騎馬模型などに表れている。

魅力その四：金嶺寺建築遺跡は、現在に至るまで唯一の考古発掘を経ていて年代が燕都龍城の建築遺跡よりも古い遺跡であり、その規格にかなった構造、対称配置が反映する祭祀と儀礼的性格によって、無限の思いをはせさせる。

魅力その五：原始的な形態、完全な組成、共存関係が明確な大板営子土器群の出土は、中国北方鮮卑土器系譜の時期区分と類型学研究に重要な標識資料を提供した。

この他に、三燕文化自体にはなお多くの史料証拠、人々によって解き明かされることを待っている謎が存在する。例えば龍騰苑の謎、大棘城の謎、前燕紀年墓の謎などである⁽⁷⁾。言うまでもなく、これら解明を待つ謎が三燕文化のさらに大きな魅力の在処なのかもしれない。まさしく上述のような魅力の吸引力によって、以下で述べる関連研究の展開を促進し、また、継続的に新事実を示すことによって、人びとに新たな思考をかきたてている。

(1) 考古学研究の面において

① 鞍金具について

三燕文化のもっとも象徴的で代表的な遺物である金製歩揺飾と金銅製透彫鞍金具は、北票と朝陽域内で出土しているとはいえ、両者を比較すると後者は前者と異なる点がある。

金製歩揺飾については、北票域内で出土した歩揺は年代系譜上に一定の変遷がある。すなわち、相対的に年代がもっとも早い房身村の歩揺（3世紀末～4世紀初）→喇嘛洞 I M7号墓の歩揺（3世紀末～4世紀中葉）→馮素弗墓の歩揺（415年）の順序となり、形の上では複雑なものから簡素なものへと変化し、さらに板状の牌座（山題）から十文字板金へと変遷をみせる。日本の研究者は、朝鮮半島では5世紀前半に新羅・加耶の金冠として姿を現す、この種の枝幹の長い樹木形装飾のある金冠は、いずれも慕容鮮卑の歩揺文化と聖樹思想の伝播と影響下の産物であろうと考えている。6世紀以降、百済の影響を受けて日本の藤ノ木古墳でもまた新たなタイプの歩揺冠が出現している⁽⁸⁾。

鞍金具は、現在までに全11点（組）の鞍金具が発見されており、8ヵ所から出土あるいは回収されており、そのうち喇嘛洞墓地出土のものが5点（組）ある。この5点（組）の鞍金具には、以下の顕著な特徴がある。

1つ目の特徴は、A型とB型の併存である。田立坤の研究によると、これら鞍金具は平面形が鋌形に近いA型と楕円形に近いB型の両種があり、両者は共に高橋鞍に属す⁽⁹⁾。このうちA型鞍金具は北票市と朝陽県内で発見されているが、B型鞍金具は北票の喇嘛洞墓地にのみみられる。このため、もし朝陽の十二台郷磚廠88M1号墓出土の2組の金銅製

透彫鞍金具をもっとも代表的なA型鞍金具とみるならば、喇嘛洞ⅡM101号墓出土の1組の金銅製透彫鞍金具はB型鞍金具の典型例であることは疑いがない。このタイプのB型鞍金具は現在のところ中国国内ではいまだその他に出土例がない一方で、日本の誉田丸山古墳から出土しており、日本の研究者は「特異な楕円形平面の鞍金具」と呼び、慕容鮮卑の三燕で製作された「舶載品」の可能性が極めて高いとする⁽¹⁰⁾。

2つ目の特徴は、青銅製のものと鉄製のものの併存である。喇嘛洞の鞍金具中には、喇嘛洞ⅡM101号墓出土の金銅製透彫鞍金具の他に、さらに鉄製鞍金具がみられる。すなわち喇嘛洞ⅡM202号墓で出土した素面で鈕のある鉄製鞍金具と喇嘛洞ⅡM266号墓で出土した鉄地金張鞍金具であり、その形はそれぞれ前述したA型とB型銅製鞍金具とまったく同じである。言うまでもなく、これは両者の空白を埋める重要な発見であり、中国の両晋期と朝鮮半島の三国時代、日本の古墳時代の馬具発展史の中で重要な地位を占めている。

上述の特徴の他に、現在までに鞍金具片が出土した墓については、喇嘛洞ⅡM101号墓と喇嘛洞ⅡM202号墓は、鞍金具と人骨がともに残存状況が良好で、比較的位置関係も明確な墓である⁽¹¹⁾。この2基はともに大小各1点の鞍金具1組が副葬され、いずれも死者の足元に置かれていた。注目に値するのは、この2点の鞍金具が上小下大（すなわち足により近い所に小さい方が、足からより遠い所に大きい方の鞍金具）の形で置かれていたことだ。もしもこの配置方法と人骨の埋葬方法と頭向を関連づけて考察するならば、これは一種の暗示のようだ。すなわち、大きい方の鞍金具は人体の前、小さい方の鞍金具は人体の後ろで用いられ、また鞍金具の装着方式も前大後小であったにちがいがなく、これまで一般的に考えられてきた前小後大の組合せではない。このような装着方法は、頭側が幅広く、尻側が狭くなる馬の背の形状と適合するだけでなく、騎乗者が鞍の高さが低い後輪側から足を跳ね上げて乗るのに都合がよい。

この他に、鞍金具と鐙の出土状況をみると、この両種を組み合わせ使用した馬具をもとに副葬した墓葬は少なくなく、朝陽十二台営子88M1号墓や喇嘛洞ⅡM266号墓などがあるが、鞍金具を副葬した喇嘛洞ⅡM101号墓と喇嘛洞ⅡM202号墓では、轡や鉸具といった馬具はすべて揃っているのに鐙の副葬がみられず、これはやや一筋縄でいかない現象である⁽¹²⁾。これについて、可能な解釈は、すなわち、これら鞍と共に副葬された鐙は、もしかしたら保存されにくい皮製であ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このような鐙を研究者は「繩套式馬鐙」【繩紐式の鐙】と呼んでおり、雲南省晋寧の石寨山前漢中期墓（紀元前2世紀）で出土した1点の貯貝器上にみられる。この貯貝器の戦争場面を表現した形象の中で、裸足の一騎士が足の指を馬の腹に垂れた片方の鐙に入れている⁽¹³⁾。このことから推測できるのは、朝陽十二台営子88M1号墓の金銅製輪鐙だけでなく喇嘛洞ⅡM266号墓の木芯銅板張輪鐙も、その使用範囲はそれら身分が比較的高い者に限られていたという点である。鐙

の普及・展開の初期には、木と金銅によって製作した硬い鐙と皮革で製作した柔軟な鐙が併存し、相関関係にあった段階があるようだ。

② 北燕馮素弗墓の後続的研究について

これについては、2点が注目に値する。

第一に、『晋書』馮跋載記によると、馮素弗は北燕燕王馮跋の弟で、皇族嫡親といえる。規格性の高い墓制と漢と鮮卑、あるいは西域文化の要素を含んだ大量の副葬品は、十六国期という、特定の歴史条件下にあった民族関係と文化交流の重要な物証である。馮素弗墓は石槨構造、墓の主軸、牛を用いた祭祀、犬の殉葬、鍔等の面で北方鮮卑文化の伝統をとどめるほかに、例えば冥印、蟬文金璫、鉄旗座と安車、彩画棺と壁画、中原式の生活用具（青銅製甗、鉄鏡など）と文具（硯と墨）、および武器・狩猟具などが中原文化の風格を示している⁽¹⁴⁾。

この両種の異なる文化要素が関係した馮素弗本人の族属の問題は、関連研究の深化にともない、まるで問題ではないことが「問題」となったかのようだ。もともと馮氏が鮮卑化した漢人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史書上の関連記載にもとづいて確認されたもので、学术界の普遍的な認識となっていた。しかし、日本の研究者の研究成果はかえって真逆のもので、馮氏は漢化した鮮卑人とする⁽¹⁵⁾。そしてこれによって想起される観点として、馮素弗墓、崔暹墓、李廐墓の3基の墓の中で、崔暹墓と李廐墓の紀年は年号を刻んだ墓標あるいは墓磚という副葬品から直接確定したが、身分と墓葬規格が最高の馮素弗墓のみは文字による紀年刻記がみられず、副葬された「范陽公章」や「遼西公章」など、4点の漢文官印と『晋書』馮跋載記中の関連記載にもとづく被葬者の身分考証および卒年記載を通じて確認できたものだという点である⁽¹⁶⁾。この点と、身分等級が高くない崔暹墓と李廐墓が、意を凝らした墓表あるいは墓磚の形でもって自身の漢人という身分と没年を表明した方法とはあきらかに異なっている。この点は、鮮卑人である馮素弗が漢字に習熟していなかった、それとも故意に自身の鮮卑としての原籍を隠し、紀年を墓内に文字で残さ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なのだろうか。その上、それら副葬品が示す多くの漢文化要素に比べて、葬制と葬俗にみられる鮮卑文化の要素は、さらにある種、根源が深く、強固で容易に変わらない文化要素である。このため、この一点からみて、通常は鮮卑化した漢人とみなされている馮素弗は、漢化度が非常に高い鮮卑人であった疑いを完全に排除することは難しいようだ。

第二に、最初に発表された馮素弗墓出土馬甲小札資料は、多くは若干錆びて片同士が貼り付いた小札からなる残塊であった。これら残塊上には、往々にして本来の小札構成と綴じ合わせの痕跡が残っているため、甲冑研究においてそれらは大量の単体小札片よりも典型例としての意義を有している。このため、小札単体に対してそれを一般的に「典型塊」と言う。このうち小札長が7～8cm以上のものは馬甲の小札とすべきである。このような

小札の孔は比較的多く、あるものは30個以上に達し（例えばⅠ、Ⅱ型片）、その綴じ方もまたそれに応じて複雑かつ稀にみるもので、これによって馮素弗の將軍としての身分にふさわしい鉄製馬甲の構造と製作工芸をうかがいみることができ、これは珍しいことである⁽¹⁷⁾。これらばらばらになった典型塊は、全体復元をおこなう価値をすでに失っていたものの、小札の革綴や覆輪の痕跡の保存状態、およびそこに残されていた製作技術の情報からいうと、喇嘛洞ⅠM5号墓の鉄製馬甲よりもより良好で、より一層内容豊富なものである。

③ 金嶺寺建築遺跡の発掘と研究

金嶺寺建築遺跡の発掘および発掘報告の公表は、三燕文化研究の新たな進展の重要な指標の一つである。一般的に、この建築遺跡は慕容部が初めて遼西大凌河流域に居を定めた早い時期の高等建築遺跡で、前燕早期の都城の性格をそなえ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その建築プランには縦軸線と横軸線に沿って均衡をとる対称方式を採用しており、「間」を単位とする1基の建物と院落（中央の建物を版築壁が取り囲む区画）を構成し、さらには奇数の院落がグループとなった建物群という、いくつかの建築単位を構成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な念入りの設計を経た建築プランは、あきらかに中国古代社会の宗法と礼教の性質を有している。すなわち、建物外周を取り囲む防御作用のある壕の出現は、この建築が封建的な集権政治と関係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¹⁸⁾。田立坤はこの建物址の配置の特徴に対する分析において、『晋書』慕容儁載記の関連記載から、それが特殊な礼制建築、つまり「庖廟」であるという仮説を最初に提示した。「庖廟」はすなわち「慕容庖廟」を指す。この廟は慕容儁が357年に建てたもので、後燕末年まで用いられ、北燕に廃れた⁽¹⁹⁾。この仮説は、建築址の平面プランの復元から、5組の建築群（現存するのは3組で、ほか2組はすでに河流で破壊）で構成されたとする。このうち北面中央と東廂・西廂建物群は、3つの並列する院落で建物群を構成し、合計9つの院落がある。北面西部と北面東部の建物群は、共に5つの並列する院落が建物群を構成し、合計10の院落がある。こうして南面する平面「凹」字形の建築址群を構成した。このように、全体配置だけでなく部分構成の上でも中央に引いた中軸線を中心とする左右対称の配置プランであり、最大の特徴はその奇数対称配置にある。このように、建築構造上に意を凝らして均衡と対称を追求する現象は、漢長安城南郊の礼制建築である王莽九廟と比較的類似する⁽²⁰⁾。中国北方の古代少数民族の中で、慕容鮮卑は漢化がもっとも早く、もっとも深く達した民族であるからには、この種の祭祀性と儀礼性を備えた建物の設計と造営において、何がしかの、例えば「三路三重」、「五社五稷」、「九五之尊」など、ある種「数字化」した漢文化の伝統的礼制の観念寓意を移植できたのであろう。この点において、金嶺寺建築遺跡の奇数対称配置は我々にさらに思考を進めるための空間を残したといえる⁽²¹⁾。

④ 喇嘛洞墓地出土鉄器の系統的整理と研究

中国冶金史の観点から、喇嘛洞墓地で出土した十六国期の大量の鉄器は、そのもっとも魅力の所在するところである。鉄器の量と種類の多さ、副葬の普遍性は、どれも現在中国国内で発見されているその他の地区の鉄器時代的大型墓地にはないものである。基礎的な統計をみると、鉄器を副葬した310基の墓において、全部で各種鉄器2740点（組）以上が出土し、各墓葬は平均で8点以上の鉄器を副葬し、生産工具、武器、馬具、その他の計5類80種以上を含む。このうち農工具、武器、馬具が喇嘛洞墓地出土鉄器の主要器種である。東アジアの範囲でみると、喇嘛洞墓地出土鉄器は朝鮮半島で発見された三国時代の鉄器、および日本の九州から発見された古墳時代の鉄器と、形、種類、組成、および反映している総体的文化様相において顕著な一致をみることができる。したがってこの三者を一つに合わせて、それを4～6世紀にける東アジア地域の独自の特色をそなえた完全な鉄器系統であるとみなす。この鉄器系統の主要分類が8種の農工具（犁、鋤、鋤先（あるいは鍬）、鎌、斧、手斧、鑿、刀子）、4種の武器（剣、刀、矛、鏃）、4種の馬具（鞍金具、鐙、轡、鉸具）の合計16種類を代表的器種構成とすることから、かつてそれを「三鉄十六器の東アジア鉄器系統」と結論付けたことがある⁽²²⁾。この系統中の鉄器はいずれも副葬品として意識的に当時の墳墓内に置かれたもので、そのためそれが反映している歴史的、文化的情報はさらに豊富であり、研究価値もより一層高い。この点からして、たとえ東アジア地域の鉄器の源が中国中原地区であるとしても、それとは比べ難い。したがって喇嘛洞墓地出土鉄器を主要かつ重要な構成部分とする4～6世紀の東アジア鉄器系統は、全古代人類の社会史中の鉄器時代において重要な地位を占めているといえる。

⑤ 大板営子墓地の墓葬資料の再整理

該当する墓地は3次の発掘を通して合計28基の墓を調査した。このうち一部の墓葬資料は、2003年と2010年に発表された⁽²³⁾。同墓地の墓葬は大部分が完全な状態で保存されていたため、三燕文化の墓葬構造と土器の研究に対する価値と影響は大きい。そのため最近未発表であった未盗掘の12基の墓の関連資料を整理し、概報を公表した⁽²⁴⁾。現在すでに発表されている資料からみて、朝陽の十二台磚廠両晋墓群、科爾沁左翼後旗の舍根墓群と新勝屯墓群を代表とする初期鮮卑の遺跡において、新勝屯墓群はわずか2基で土器数も限られ、舍根墓群の土器は数がやや多いとはいえ、多くは採集品である。このため、大板営子の土器と総体的な比較ができるのは、十二台磚廠両晋墓群で出土した土器群のみである。統計をみると、大板営子墓地の23基の墓内で出土した58点の土器のうち、罐と壺はそれぞれ37点と21点で、壺の数は全体の半分に達していない。十二台磚廠両晋墓群は合計21基で、出土した壺と罐はそれぞれ21点と12点であり⁽²⁵⁾、壺の数がすでに罐を大きく上回っている。

夾砂大口罐と泥質灰陶壺の出現は、後漢期に始まった内蒙古東北部から南に向かって大

凌河流域へと達する、北から南へと前後関係を持って相次ぎ、あわせてこの両種の土器を代表とする土器組成を形成した。この土器組成は初期鮮卑の典型的な遺跡、すなわち後漢晚期～西晋期の西拉木倫河流域と大凌河流域で流行した。大板営子墓地は遼西地区におけるこの土器組成の代表であり、またこの土器組成が遼西地区に流入した原初形態である⁽²⁶⁾。慕容鮮卑は遼西に侵攻した後、急激に漢化を始め、土器組成もまた変化し、夾砂大口罐と泥質灰陶罐が相次いで消失する。これらのことから、大板営子土器群が北方地区の鮮卑土器体系の研究のなかで果たす役割は一層重要である。

(2) 考古科学的研究

喇嘛洞墓地の考古発見を契機として、日中共同研究と科学技術の手法を取り入れた考古科学的研究が相次いで展開された。

① 鉄器の保存処理、金相鑑定および人骨研究

第一に、喇嘛洞墓地は副葬された鉄器がもっとも多い大型墓地で、その総数は2740点以上にのぼり、全副葬品総数の半数以上を占めている。この点は現在中国国内で発表されている大型墓地の報告のなかで、いまだなお類をみないことである。1996年11月、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と奈良文化財研究所は共同研究協定を締結した。研究課題は「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古代都城遺跡と保存に関する研究—三燕都城等出土の鉄器及びその他金属器の保存と研究」であった。この共同研究において、我々と日本側専門家は鉄錆に含まれている塩化物と硫化物について共同で測定と分析をおこない、数器種の鉄器の腐食状況をもとに選別した30点の鉄器標本に対して水酸化リチウム水溶液法(LiOH)で保護処理を実施した。これは中国国内で最初の例であった⁽²⁷⁾。

第二に、北京科技大学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と共同で、喇嘛洞墓地出土鉄器中から選別した32点の標本に対して金相鑑定をおこなった。そのうち農具は9点、工具は7点、武器は11点、その他器種は5点である。鑑定結果から判明したのは、喇嘛洞墓地の鉄器は材質と製作技術の上であきらかに秦漢以来中原地区で発達した鋼鉄製造と鍛造技術の影響を受けており、技術の上で中原地区と同一の技術体系に属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²⁸⁾。これら鉄器標本は鍛造製品が主で、合計26点あり、鍛造製作技術がすでに主要な鉄器製作技術となっており、当時の工匠は様々な温度と鍛打条件の下で鉄の性質が変化する法則をすでに基本的に把握していたことがあきらかとなった。これらの鍛鉄素材はまた炒鋼(鑄鉄から脱炭)が主であり、合計13点のうち8点は武器で、炒鋼法がすでに主要な鋼製造技術となっており、また広く軍事上に応用されていたことが明らかとなった。北燕の馮素弗墓に副葬された16点の鉄器に対して初めて金相鑑定を行った結果、材質が優良な鑄鉄脱炭鋼の鉄器が過半数を占め、その他に夾鋼の鑿、炒鋼を焼き入れした劍、および炒鋼を鍛打して作っ

た鉄鏡などがあることがわかった⁽²⁹⁾。

喇嘛洞墓地と馮素弗墓双方の金相を比較すると、鑄鉄脱炭鋼については、喇嘛洞墓地出土鉄器中では鑑定総数の1/3になお達しないが、馮素弗墓の鉄器では鑑定総数の半数を占める。このことから、前燕から北燕期にかけての鮮卑社会の中で、鉄器使用の普及にとともに、この種の鉄を生み出す過程に退火処理をして作った鑄鉄脱炭鋼がすでに使用率の非常に高い鉄器素材となっていたことがわかる。

第三に、吉林大学遼疆考古研究センターと共同で、喇嘛洞墓地で出土した人骨標本に対して系統的な科学鑑定を実施した。鑑定結果からあきらかとなったのは、喇嘛洞の三燕文化住民の遺伝学的構成は単純ではなく、「多源的同種系」の集団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る。喇嘛洞三燕文化住民の高顯性質は、その構成主体部が東亞蒙古人種の範疇に属することを明示しており、朝陽地区で発見されたその他慕容鮮卑住民が偏低性質の北亜人種の特徴であることと大きな隔たりがある。このため、両者の族属はおそらく一致しない。これは400体以上の大量の標本データをもとに得た結論であるので、その科学性ゆえに疑う余地がない⁽³⁰⁾。この鑑定結果と密接に関係するのが喇嘛洞三燕文化住民の族属問題である。これについて、学術界では、「鮮卑説」（慕容鮮卑と宇文鮮卑）と「扶余説」の2つがある⁽³¹⁾。この鑑定結果はあきらかに「鮮卑説」を支持せず、すなわち「扶余説」を支持するのだろうか。しかしまったくその通りとはいえないようだ。喇嘛洞三燕文化住民の顔面部の特徴は、歴史上、吉林省四平地区あるいは農安地区の後漢後期の扶余族が有する「古東北類型」の顔面特徴ともまた大きな違いがあり、形質的特徴の複雑性はその人種系譜の源の多源性を明示している⁽³²⁾。目下、扶余族に関係する人骨鑑定の大量標本データはこの喇嘛洞人骨と比較をおこなうにはなお不足しており、形質人類学の角度から「扶余説」を肯定するのはあきらかに適切ではない。

要するに、族属問題では目下、古文献の関連記載を考古資料と合わせて得た定性分析的結論が存在しており、人骨鑑定研究から得た定量分析的結論と照らし合わせて接ぎ合わせする、あるいは整合するという課題がある。中国北方十六国期の人口大移動、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衝突の歴史条件が慕容鮮卑の民族構成成分の複雑性を決定し、この種の複雑性が我々のこの時期の民族の族属判定の難度を大いに引き上げている。これにかんがみると、許永傑はかつて「考古学文化の族属研究は系譜研究の基礎の上に構築すべきだ」、「考古学文化の族属研究の実践は、この種の系譜分類法が簡単な三要素分類法（すなわち時代、地域、文化特徴）より優れていることを明らかに示している」と指摘したことがある。彼は帰納的比較分類で拓跋鮮卑と慕容鮮卑とが関係する考古遺跡の各自特有の文化特徴を指摘する際、「副葬土器は考古学文化の系譜を認定し考古学文化の族属問題を検討する上で、決定的な作用を持つものだ」と指摘している⁽³³⁾。このため、喇嘛洞三燕文化住民の族属問題

を議論する際、喇嘛洞土器群が老河深土器群と文化的特徴の上で明確に異なっていることは軽視できない重要な点である。

② 鉄製甲騎具装の復元研究

鉄製甲騎具装は我が国北方十六国期の重装騎兵の装備として流行した。考古学で発見されたこれと密接に関係する遺物として、鉄製の人冑、馬冑、および共伴する大量の小札堆積がある。目下のところ、墓内に同時に3種の遺物が副葬された例は、朝陽十二台88M1号墓を除くと喇嘛洞 I M5号墓と喇嘛洞 I M17号墓がある。このうち、1988年5月に最初に発見された朝陽十二台88M1号墓は、この種の遺物を副葬した重要墓葬である。しかし遺憾なことに、調査過程で経験の乏しさから小札堆積の処理を間違い、それは最終的に復元価値を失った。1995年秋にこの3種の遺物で構成された甲騎具装残骸が再び喇嘛洞 I M5号墓内で出土し、外箱で覆って切り取る套箱法で墓中から全体を取り出し保存した。2003年の夏から秋の間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の白栄金の指導と協力の下、再度、箱内の小札堆積に対して室内調査と復元研究を行った。この小札堆積中の人冑、馬冑、多様なタイプの小札が共存する状況の考察を通じて、小札堆積中の「典型塊」上における原位置と綴じ合わせ方法、およびその他関係する図像資料を総括し、一定の製作工程と製作技術に照らして比較と分析を繰り返した上で、実証復元を主とし推測復元で補完し、数ヵ月の努力を経てついに国内第一領目の甲騎具装の紙板模型を復元製作した⁽³⁴⁾。鉄製甲騎具装は当初、1988年春に十二台磚廠88M1号墓で発見されたものの、ついにそれを復元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は遺憾であった。そして喇嘛洞 I M5号墓鉄甲騎具装の復元は、ついにその時の遺憾の思いを満たした。

喇嘛洞 I M5号墓甲騎具装の復元研究にならい、近年、喇嘛洞 I M7号墓の鉄甲堆積に対して系統的な室内調査と基礎研究を行った。その整理は喇嘛洞 I 5号墓甲騎具装の復元研究に後続するもので、すでにある経験と方法を手本とし、また参照して、喇嘛洞墓地で出土した小札堆積に対して第2次の科学的・系統的室内調査を行った。喇嘛洞 I M17号墓の小札堆積の腐食度と保存状態は共に喇嘛洞 I M5号墓より深刻であったため、今回の整理で喇嘛洞 I M7号墓甲騎具装を本来の姿に完全復元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ものの、堆積した甲片を科学的・系統的に取り上げて基礎的な分類・検討をすることで、今後の関連復元研究に有益な参考・模範例を提供するものと信じている⁽³⁵⁾。

3. 地域的文化の表示あるいは符合としての三燕文化

(1) 三燕文化と大凌河文明

もし、文明がある種の歴史文化の沈殿であるとするならば、遼西域内で流れている大凌河というこの文明の長い川の流れの中で、三燕文化はそのもっとも厚い沈殿堆積の一つで

ある。早くも3世紀初めに、中国北方地区の少数民族の一部であった東部鮮卑は、内モンゴル中部の代々居住した地を離れてまずその先祖莫護跋の引率の下に遼西に入居した。続いてその第3代首領の涉帰にしたがって遼東の北に遷居した。289年、東部鮮卑慕容部は首領・慕容廆の統率の下、再び徒河の青山（現在の大凌河中上流域一帯）に移った。この後、半世紀近くの創業の苦難を経た後、ついに大凌河流域を地盤として国を建てた。立国の前および以後で、慕容鮮卑は漢、扶余、烏桓、高句麗などの民族との間で衝突と融合、そして文化上の衝突と吸収をたどり、光り輝く慕容氏の鮮卑文化を主要構成内容とする地方的民族文化である三燕文化を創造した。前述のとおり、現在の考古学的発見でみつまっている三燕文化に関する重要な史跡の中には、北票域内に金嶺寺建築遺跡、三官甸子遺跡、喇嘛洞墓地、大板営子遺跡、朝陽域内に、龍城南門遺跡、団山子遺跡、十二台営子墓地、袁台子墓地などがある。空間的な分布から、これら遺跡と墓葬は大凌河兩岸に沿っておよそ年代順に北東から西南に並んでおり、一本の川が両地を貫いて流れる（すなわち大凌河中上流が朝陽東北部と北票西南部を貫いて流れる）ことにより構成された「三燕文化史跡回廊」を形成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な三燕文化遺跡の空間配置の形成は当然、偶然ではなく、十六国期の民族の移動と融合、文化の交流と影響という歴史条件の下で、地理的要素（生態環境と資源条件）と人文的要素（慕容鮮卑社会の政治・経済・軍事的発展）の相互作用によって生まれた必然的結果である。

（2）三燕文化・遼河文化・遼海文化

経済的大発展と文化的大繁栄にある当時期において、地域文化の標識の確立はすでに各地の文化を築く際の重要事項となっている。どの種類の文化をもって遼寧地域の文化標識あるいは文化記号とするかという問題については、かつて学界には「遼河文化」説と「遼海文化」説があった⁽³⁶⁾。この2説がもつ各種論拠はさておくとして、遼寧は海に面した省であるというこの一点からすると、「遼海文化」が「遼河文化」よりも文化的魅力と符合的意義をよりそなえていると思われる。歴史からみて、人類社会および創造されたすべての文化と文明が生存と発展のために依拠するもっとも基本的かつ重要な自然資源は、それが所在する地域内の水系にはかならない。遼河は遼寧省内第一の大水系ではあるが、その主要流域は遼北の低丘区域を含む遼河平原で、遼西地区の大・小凌河と遼東地区の靉河と渾江は共に遼河水系から相対的に独立し、その外にある重要な水系である。これら水系と関係する生態環境をもとに歴史上生み出された、または発生した地域色ある重要な影響を与えた兩種の文化が、十六国期の三燕文化と両漢から隋初期にかけての高句麗文化である。したがって、遼海の「海」は百川を収めいれるという氣勢をもってしてこそ、遼寧全域内の異なる区域の各種生態環境、多様な経済モデル、多民族の人口構成および、それに

もとづいて形成された多元化的的地域文化の形態を明示している。両者の関係は、王綿厚が「遼河文明」と「遼海文化」の関係と表現してそれをたとえたように、一種「同じ同心円内にある」、表裏をなす異なるレベルの姉妹文化の関係とすべきである⁽³⁷⁾。

しかしながら文化概念という面では、考古学的意義の「三燕文化」と文化学的意義の「遼海文化」は通じ合うところがあるのだろうか。答えは通じ合うところがある、である。学界は、「遼海文化」の主な特徴を「闡閩東（山海関を越えて閩東へ移り住む）」を代表とする移民文化と満漢融合によって主導された北方多民族文化の集合であると帰結した⁽³⁸⁾。現に、「移民文化」と「多民族文化の集合」がどうして「遼海文化」の二大特徴でないことがあろうか。すなわち、この二大文化特徴を形成した歴史的源は、国史から考えても、史跡からしても、遺物にもとづいても、最古は三燕文化に遡ることができる。前述のように、慕容鮮卑を内包する東部鮮卑は、早くも3世紀中葉にその祖先・莫護跋の引率のもと、遼西に入居した。これがこの地域の文化形態に重要な影響を生み出した有史以来最古の「移民事件」である。そしてこの慕容鮮卑を内含する東部鮮卑移民、およびその後裔あるいは後継者によって創造されたのが三燕文化であり、さらには鮮卑、漢、烏桓、扶余、高句麗等の文化が融合して一体となったのが「多民族文化の集合」である。歴史上、現在の遼寧省内に流れ込んだ多くの北方少数民族の中で、最初に封建割拠の形で自身の国家政権を建て、その割拠した地を礎に王朝統治者となったのは慕容鮮卑のみである。また、歴史地図上からうかがえるのは、慕容鮮卑が建てた3つの燕国のうち、5世紀初めに建国して現在の遼西の一端を居とした北燕を除き、そのうちの前燕と後燕の版図はいずれも現在の遼寧全域をほぼ管轄し、その南境界は現在の河南省安陽から安徽省蚌埠の間の淮河一帯に達していた⁽³⁹⁾。この両王朝が維持された統治期間は長くないが、それが刻みこんだ歴史の烙印は深く、生み出した文化影響は長期にわたり、後世の遼における契丹・元における蒙古などの騎馬民族文化中にいたるまで、何らかの慕容鮮卑文化の伝統の影をみ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のように、考古学的意義における三燕文化は文化学的意義における遼海文化の重要な歴史的源の一つなのである。

（3）三燕文化の記号的意義・顔としての価値・ブランド戦略

「文化符合」【文化記号】、「文化名片」【文化名刺：文化を代表する顔】、「文化品牌」【文化ブランド】が目下、メディアと文化界に流行する3つの流行語である。いわゆる「文化符合」とは、すなわちある一地域の文化の記号としての呼称を指し、それは一定の時空間的範囲内に特有の歴史・人文的文化形態を代表する。関連研究の報告によると、文化界ではすでに「遼海文化」を遼寧の地域文化記号としてすでに確定した⁽⁴⁰⁾。これと関係する「遼河文化」を、文化史学者は在地文化の1本の根幹的性格をそなえた「文化結合樹」である

とみなしている。彼らは各市県が提唱する郷土の特色ある文化はいずれもこの「結合樹」の一本の枝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る。このような郷土文化を切り口とすることは、「人文遼寧」の建設に有利である⁽⁴¹⁾。大凌河流域を西遼河流域の一部とみるならば、大凌河流域に根差す三燕文化はまた、この「文化結合樹」の重要な分枝の1本である。「三燕文化」を大凌河・朝陽・北票を内に含む「一河兩岸」文化の呼称とすると、これは現在の旅行業をトップとする文化産業の空前の繁栄下では、郷土の特色ある文化建設の不断の強化を通じて科学的、合理的に在地の文化資源を利用し、内包する歴史を十分に発掘し、その文化の魅力を明らかにし、またこれによって地方経済の建設と精神文化の建設の協調的發展を促進することとなり、いずれも積極的かつ現実的な記号的意義を備えている。

造形が独特の金製歩揺冠飾、金銅製透彫鞍金具を代表とするほぼ完全な形の金銅・鉄製馬具類、珍しい甲騎具装、多くの紀年墓、大型墓地、および宮城皇苑と関連する建築遺跡は、すべてこれらは三燕文化の重要な特徴であるだけでなく、3～5世紀における三燕文化の創造者がすでに21世紀の現代文明世界に突入している我々に提示した1枚の独特な「文化名片」である。いかにこの文化名片を使って遼海文化の歴史内容を不断に充実させ、その榮譽を高め、三燕文化を全国そして世界に向けて打ち出すかというのが、目下、地域文化建設の重要任務の一つである。国内外の関連地域間で文化交流と学術協力をさらに強化し、三燕文化に対して学際的研究を継続して進める。あわせて郷土歴史文化の普及教育を主旨とするパブリック・アーケオロジーを展開し、三燕文化を学術の枠から取り出して社会に向かって大衆に普及させ、世間に流布する科学的一般常識としてこそ、三燕文化の名刺価値を最大限のもの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中国共産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の報告では、文化は民族の血脈で、人民の精神の故郷であると明確に指摘された。科学発達、学術繁栄、文化建設が勃興する今の世の中において、どのようにして上述の記号的意義と顔としての価値をそなえた三燕文化を全国的な地方文化建設の動きの中で、研究成果をさらに増やし、知名度を高め、それによって影響力が大きい地域的文化ブランドに作り上げるか、それが我々が不断に思考し模索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課題の一つである。この企画製作と三燕文化のブランド戦略遂行には非常に長期にわたる時間が必要で、また多くの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仕事がある。それは例えば以下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る。三燕文化史跡の系統的調査、探査、および重点発掘と研究。前述の「三燕文化史跡回廊」上の遺跡公園と墓園の建設、景観設計、保護と遺跡申請。三燕文化を主題あるいは主要内容とする郷土教材の編纂とパブリック・アーケオロジーの展開。三燕文化旅行専門ルートの開拓を主な内容とする文化産業の運営、等々である。しかしながら、我々が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で提出された社会主義文化強国建設に関する既定方針をしっかりとかと着実に貫徹し、粘り強く物事にあたるという精神を発揮し、長期にわたる不断の努

力を経た暁には、三燕文化を地域色ある文化ブランドに作り上げるという戦略構想は必ずや実現できるであろう。

註

- (1) 陳大為「遼寧北票房身村晋墓發掘簡報」『考古』1960年第1期。
房身8号墓出土の金製步搖飾については以下を参照した。
孫国平「試論鮮卑族の步搖冠飾」遼寧省考古、博物館学会編『遼寧省考古、博物館学会成立大会会報』1981年。
- (2) 黎瑤渤「遼寧北票県西官営子北燕馮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
- (3)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北票市文物管理所「遼寧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4年第2期。
- (4) 辛岩等「金嶺寺魏晋時期大型建築群址考古發掘獲初步成果」『中国文物報』2001年。
- (5) 万欣「遼寧北票市大板営子墓地的勘探與發掘」『遼寧考古文集』2、科学出版社、2010年。
- (6) 万欣「鮮卑墓葬、三燕史迹與金製步搖飾的發現與研究」『遼寧考古文集』1、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年。
朝陽県内で発見された三燕文化の重要な遺跡については、以下を参照した。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朝陽王子墳山墓群1987、1990年度考古發掘的主要收穫」『文物』1997年第11期。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朝陽十二台郷磚廠88M1發掘簡報」『文物』1997年第11期。
陳大為・李宇峰「遼寧朝陽後燕崔暹墓的發現」『考古』1982年第3期。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朝陽地区博物館文物隊・朝陽県文化館「朝陽袁台子東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
田立坤・万雄飛・白宝玉「朝陽古城考古紀略」『遼寧考古研究』第6輯、科学出版社、2007年。
- (7) 以下の資料を参照した。
朱子方「記後燕龍騰苑遺址的發現」『東北地方史研究』創刊号、1984年。
田立坤「棘城新考」『遼海文物學刊』1996年第2期。
辛發・魯宝林・吳鵬「錦州前燕李鹿墓清理簡報」『文物』1995年第6期。
墓標の紀年が「永昌三年」（太寧2年に相当し、324年）の李鹿墓については、その紀年は三燕紀年の範囲になく東晋墓なのであり、原報告でいう「前燕墓葬」ではない。
- (8) 毛利光俊彦（李賢淑訳）「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冠」『東北亞考古學論叢』科学出版社、2010年。
- (9) 田立坤「論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馬具」『文物』2010年第2期の表1を参照した。
- (10) 桃崎祐輔（姚義田訳）「從倭出土的馬具看國際環境—倭與朝鮮三国伽耶、慕容鮮卑三燕的交往」『歷史與考古通信・東北亞』2008年第1期。
- (11) 同註（3）図4・5、図版7を参照。
- (12) 同註（3）。
- (13) 宋兆麟『古代器物溯源』143頁および附図16-4、商務印書館、2014年。
- (14) 徐秉琨「馮素弗墓的發現所引發的思考」『遼寧省博物館館刊』（2010）20頁、遼海出版社、2010年。
- (15) 内田昌功（姚義田訳）「北燕封氏與『燕志』、『魏書』」『遼寧省博物館館刊』第2輯、2007年。
- (16) 同註（2）。
- (17) 盧治萍「馮素弗墓出土鉄甲片研究」『遼寧省博物館館刊』（2011）28頁、遼海出版社、2011年。
- (18) 辛岩・付興勝・穆啓文「遼寧北票金嶺寺魏晋建築遺址發掘報告」『遼寧考古文集』2、科学出版社、2010年。
- (19) 田立坤「金嶺寺建築址為「鹿廟」說」『慶祝張忠培先生八十歲論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 (20) 楊鴻勳『宮殿考古通論』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南郊礼制建築群址発掘簡報」『考古』1960年第7期。
- (21) 中国伝統の邸宅建築の最高規格は左・中・右三路制で、その基壇は上・中・下の三重に分かれる。
五方五色とは、東青・南赤・中黄・西白・北黒を指し、国土を象徴する。
参照：韓增禄『易学與建築』111・158頁、瀋陽出版社、1999年。
- (22) 万欣「喇嘛洞鉄工初論—兼議中国慕容鮮卑、朝鮮三国時期和日本古墳時代鉄器葬俗の一致性與差異性」『東北亜考古学論叢』科学出版社、2010年。
- (23) 武家昌「遼寧北票市大板営子鮮卑墓の清理」『考古』2003年第5期および註5を参照。
- (24) 王宇・万欣「遼寧北票市大板営子墓葬の勘探與発掘（続）」『遼西地区東晋十六国時期都城文化研究』遼寧人民出版社、2017年（本書1～46頁再録・翻訳）。
- (25) 同註（6）、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1997年。
- (26) 王宇「北票大板営子墓地出土陶器研究」、『遼西地区東晋十六国時期都城文化研究』遼寧人民出版社、2017年（本書169～188頁再録・翻訳）。
- (27)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遼寧北票市喇嘛洞鮮卑貴族墓地出土鉄器の保護處理及初步研究」『考古』1998年第12期。
- (28)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鉄器的金相実験研究」『文物』2001年第12期。
陳建立「從鉄器的金属学研究看中国古代東北地区鉄器和冶鉄業的發展」『北方文物』2005年第1期。
- (29) 韓汝玢「北票馮素弗墓出土金属器的鑑定與研究」『遼寧省博物館館刊』遼海出版社、2010年。
- (30) 陳山「喇嘛洞墓地三燕文化居民人骨研究」科学出版社の「序言」（朱泓〔撰〕）、2013年。
- (31) 「扶余説」と「宇文氏鮮卑説」については、それぞれ以下を参照した。
田立坤「關於北票喇嘛洞三燕文化墓葬的幾個問題」『遼寧考古文集』1、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年。
陳平「遼西三燕墓葬論述」『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2期。
4世紀中葉に慕容皝は西北部にいた宇文鮮卑と東北部にいた高句麗に対してそれぞれ討伐をおこない、その部衆5万余（口）を移した。また『資治通鑑』晋紀 卷97によると、永和元年（345年）、記室參軍の封裕が上書して諫めた中に、慕容皝がかつて「南に強趙を摧き、東に高句麗を兼ね、北に宇文を取り、地三千里を拓き、民十万户を増」したという語があり、これによって前燕域内の多民族構成の一端をうかがい知ることができる。
- (32) 同註（30）、158頁参照。
- (33) 許永傑「鮮卑遺存的考古学考察」『北方文物』1993年第4期。
- (34) 白榮金・万欣・雲燕・俊涛「遼寧北票喇嘛洞十六国墓葬出土鉄甲復元研究」『文物』2008年第3期。
- (35) 万欣・白雲燕・趙代盈・肖俊涛「遼寧北票市喇嘛洞墓地 I M17鉄甲堆積の室内清理」『遼西地区東晋十六国時期都城文化研究』遼寧人民出版社、2017年（本書345～410頁再録・翻訳）。
- (36) a. 曲彦斌『遼寧文化通史』29頁、大連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
b. 遼寧文化符合和文化定位問題已經課題組「關於遼寧文化符合和文化定位問題的研究報告」『瀋陽故宮博物院院刊』第7輯、2009年。
- (37) 王綿厚「縱論遼河文明的文化內涵與遼海文化的關係」『遼寧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 (38) 同註（36）a。
- (39) 国家文物局主編『中国文物地図集』遼寧分卷、西安地圖出版社、2010年。
- (40) 同註（36）b。
- (41) 同註（36）a、28頁。